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

1982年10月15日

## 认真学习十二大开幕词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

邓力群

胡乔木同志准备向军队的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作一次报告，全面传达十二大的精神。我只讲讲对邓小平同志开幕词的理解，做一些说明，提供一些材料，供同志们学习时参考。

开幕词的内容，是起草十二大文件的基本依据，是十二大作出各种重要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十二大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开幕词主要有这么一些段落：大会的任务；大会的历史地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政治保证；团结起来，争取胜利。

小平同志最近在北京看望金日成同志时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我认为，这两句话是对十二大历史地位的最准确的说明。七

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历史已经作了结论，党内同志没有什么不同看法了。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广大群众相信这个判断，少数同志因为对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不那么相信。当然也有个别同志同中央政治上不一致，因此对十二大的估计就同绝大多数同志很不一样。到底小平同志的判断有没有根据？根据是什么？根据够不够？胡耀邦同志作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开幕词中有这么几句话：“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讲根据，可以列出很多方面的材料，但从制定党的路线这个意义上说，小平同志的这几句话，是最重要的，是高度概括了上述判断的充分根据的。

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讲点体会。

### （一）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

1.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说：“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

（《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十二大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从思想、政治、组织、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党的建设等方面，说明我们在三中全会以后，不但在指导思想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分清了是非，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我们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通过总结三十多年来的丰富经验，已经从过去那种不完全、不准确的状况，发展到现在比较完全、比较准确了。对于任何规律的认识，对于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通过一个过程。想一眼就把事物的规律看准，正确地把

握住，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的过程，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着这样那样的曲折，包括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即正确逐步克服错误。

2.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讲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观点，斯大林也曾经说过。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时，有人问他，规律是怎么回事？认识规律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规律没有被破坏的时候，它平安无事地坐着，它的地址谁也不知道，它是无不在又是无所在的。”通俗地讲，就是到处存在着规律，可是你找不到它在哪里。他接着说：“一般说来所有的规律都是在被破坏时才令人感觉到，

而破坏规律不能不遭殃”。例如当着空气比较充足时，人们不大感到空气的存在和空气对人们生命的必要性。好比我们这个大礼堂，空气比较充足，坐在这里讲话、听讲话，不会感觉到空气的必要，可是一旦被关闭在空气很不够的房子里，那时就很容易呼吸困难，才感到空气对于我们是绝对不可少的。

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领导革命也好，领导建设也好，都要认识规律，都需要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而且，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多次的比较，我们的认识才能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由不正确的知到正确的知。在这个过程中，怎样看待胜利和失败，特别是怎样看待失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一种极为严峻的考验。不正确对待胜利会带来错误，很多同志都有这个经验。胜利了，容易头脑发热，不那么谦虚谨慎。失败了怎么办？有一种表现是我们坚决反对的，那就是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暂时遭受挫折，就动摇，就灰心丧气，甚至当逃兵，当叛徒。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我们党的党员从六万多下降到一万多。蒋介石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员被屠杀。这些同志是英雄好汉，不愧为共产主义战士，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也有那么一些人悲观失望，脱离革命，或者从此退隐，或者在国民党报纸上登自首书，甚至成了叛徒，成了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赞成，就是对坚持革命但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以及存在某些思想动摇的同志，采取绝对的态度，把革命失败的原因仅仅归之于个人，大批大整，无限上纲，不做思想说服工作，不是采取延安整风时期那样的方针，象毛泽东同志讲的，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惩前毖后，治

病救人。结果，挨整的人和整人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训。所以革命者怎样对待失败，怎样对待错误和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遭受点挫折就悲观失望，埋怨指责，牢骚满腹，以至于不再干了，这样的“革命者”是一钱不值的。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过，无产阶级不怕承认它在革命过程中哪些事情作得非常好，哪些事情没有作好，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这些弱点。真正的革命者，应该在失败以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然后从头做起，做得更谨慎，更周密，更顽强。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要我们正确对待革命的失败和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讲，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犯了错误改正了就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不准革命”的态度，要一看二帮。要团结一切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同志一道前进，不要嫌弃他们。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不应着重于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根源的分析，从中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他警告说，一件事情失败了，大家纷纷指责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犯错误的同志神气得很，骄傲得很，头脑不清醒，这种同志昨天不犯错误，明天就一定要犯错误。这个道理不仅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实际上对于一切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人们，都同样是适用的。

十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有了八大以后胜利和失败几次反复的比较，正确地总结胜利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它因此也就比较地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3. 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来

才有绝大多数人。一种规律，一开始就为大多数人所认识，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少奇同志在延安首先提出，要尊重少数人。这是从我们经验中得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我们党内，是毛泽东同志和为数不多的老一代革命家首先认识的。是不是大家马上都同意了呢？不是这样。八大期间，少奇同志讲过，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一九三〇年以后，特别是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他还被排除在中央领导之外呢？就是因为当时多数领导干部还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只有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了遵义会议，大家回顾毛泽东同志领导时取得的胜利和“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的损失，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多数领导干部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确认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了遵义会议，有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历史转折，我们在民主革命中间，才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拿社会主义建设来讲，回顾三十多年的历史，读读《陈云文稿选编》，经过比较和思考，起码大多数同志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陈云同志是首先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人之一。一九五六年八大时候陈云同志的发言，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高度评价。一九五六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也仍然多次肯定陈云同志的主张，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注意听取陈云同志的意见。后来“大跃进”，“反右倾”，陈云同志在经济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就不大行得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提出的一些战略决策、一些重要建议，为中央所接受，在实际工作中越来越见效。这时，我们才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学习他观

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

规律起初为少数人认识，后来为多数人认识，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开始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中央最早作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即使在党内，也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成。但是实践教育了大家，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村面貌很快产生变化，广大农民日益富裕起来，并且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继续怀疑这一新生事物的同志，已经越来越少了。有些地方的有些农民，曾经把包产到户、大包干看成是分田单干，但是大多数农民都认为，必须坚持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公有制。包产到户有一阵子把土地分得很碎，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把土地分成若干等级，连成片来经营。

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于尊重少数的问题，作了很明确的规定。要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又要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对中央、对党组织作出的决定，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必须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同时也允许保留意见，可以向党组织直到党中央申诉自己的意见。我们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同时也尊重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避免片面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社会规律的群众队伍越来越扩大的过程。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极大地推进了这一过程，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人，开创了广阔的领域。但是，人民群众不能自发地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经过实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要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东西，就要通过必要的宣传、教育或者说灌输工作。这种宣传、教育或灌输工作，必须采取为群众能够接受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引导群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认识规律、掌握真理。

我们各个时期、各条战线的各级干部，可以说都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考验。特别是建国以来我们自己培养的近千万大专学校毕业生，他们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一道成长，正值年富力强、懂得各种专业知识，也经受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和考验，在不同程度上认识了社会主义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不断进步，我们的事业就必将一步步取得更大的胜利。

4. 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对规律的认识，同学术团体、科学研究院有个很大不同，就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以后要见诸行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象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

正因为正确的认识要见诸行动，所以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解决这个总路线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间怎么具体贯彻的问题。小平同志讲十二大同八大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表现在这个方面。八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是对头的，可是还不明确、不完备。十二大的路线比八大明确得多，完备得多。八大规定了一条总路线，但是它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怎么具体地贯彻执行，还没有提上日程。也是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的大会上，因为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讲了一篇道理。他说，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

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这篇道理实在说得很好。七大所以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不仅是因为规定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而且还因为规定了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种工作中具体贯彻这条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样才使得我们在七大以后，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超过原来的计划，提前打败了蒋介石。八大有一条总路线，但因为缺少各种与这条总路线相适应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因此，执行总路线，你按照你的理解，他按照他的理解，到了“大跃进”的时候，纷纷“放卫星”，说要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比八大更明确、更完备的总路线或者叫总任务，而且在各条战线上，都有了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适合于各自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了。耀邦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讲了我们的总路线即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总任务的指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对外政策、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具体制定了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规定了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五年间要实现三个根本好转的具体步骤。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认为，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是符合实际、符合认识论的规律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打仗，说为什么战争指导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

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对于革命者，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办一切事情都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的区别。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是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说，就是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毛泽东同志讲，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没有的。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使主观符合于客观。完全符合是没有的，但是可以比较符合或者基本符合。有了这一条，这个领导就是基本正确，或者说在整体上来看是正确的。十二大文件，我们党中央的各项决策，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我们还会遇到困难，遭受挫折。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深化和完善，但是正因为我们能够基本上或者说比较好地解决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所以我们将会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能比较快地发现和纠正。这样来看我们的中央，这样来看我们的党，这样来看我们的多数干部，是不是公正的？我认为是公正的。因此，怀疑十二大的决定，怀疑十二大制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怀疑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想通，完全可以保留意见，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规律一定会证明，在实践的教育下，曾经有过怀疑的同志，一定会对事实表示信服。

##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开幕词讲，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这一点非常重要。

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的口号，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这么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光荣的使命，要

求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产党人，首先依靠和团结本国家、本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打败反动派，在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内，完成革命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的崇高品质。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产党人要首先按照共产主义的精神把本国、本民族的事情办好。不能坐等别人的援助。坐而论道，空谈共产主义，不行动，不战斗，不准备牺牲，想等人家革命搞成功了来给自己帮忙，这是曲解国际主义。你是国际主义者，就要首先在本国、本民族的范围内完成根据当时、当地情况提出的任务。完成本民族、本国的任务，必须正确认识本民族、本国的实际，由此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正确的行动。外国的经验、别民族的经验当然要借鉴，但必须分析哪些适合于本国的情况，哪些不适合于本国的情况。即使适合，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不能够全盘照搬。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前面是说最一般的战争的规律，进一层是说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又说：“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这就更进一步具体化了。讲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候，他指出：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也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后来战争的情况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非常丰富，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就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至于建国后的抗美援

朝战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每个时期战争的规律不同，对每个时期战争的指导也不能完全一样。这就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有所发展，有所创造。这是说战争。革命的指导，建设的指导，也得这样办。不能停止于我们过去在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办法，不能只知道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律或者我们建国初期搞建设的规律。要研究在当前中国的新情况下搞建设的规律。这里涉及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问题。正象开幕词讲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不能只是了解建设的一般规律，还一定要了解一般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以及我们自己在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某些特殊规律。

这些年来，讨论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的思想界、理论界很活跃。过去，我们同外国的文化、学术交流很少，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知道得不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知道得更少。这几年我们出去考察，请外国学者到中国来讲学，翻译出版有关著作，对外国的情况、经验，知道得比过去多了，学习外国的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也比过去好得多了。首先应该肯定，主流是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程度不同地有照搬照抄的现象。过去搞革命，我们照搬照抄吃过大亏。搞建设，在工业问题上，在计划管理上，照抄苏联，我们也吃了亏，有些问题到现在也还有待于解决。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有几种模式时，比较多的同志认为有三种。这样一些问题当然要研究。我们现在不是研究多了，还研究得不够。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只能从这三种模式中间，找一种来套在自己身上。小平同志说要走自己的道路，这话是有针对性的。研究人家的模式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只能够供我们参考。我们的路要由我

们自己来走，不能照搬这个模式那个模式，哪怕是到处叫好的模式。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各个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又是十亿人口、其中八亿农民的大国，把苏联、日本、美国、东欧、西欧的农民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农民多。还有一点，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党同中国各族人民，已经有了六十多年同战斗、共甘苦、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在农村问题上也犯过错误，但是我们党同广大农民有这么深厚的联系，这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很突出的。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各种社会生活中间，谁也抹不掉的、带有根本意义的特点。“大跃进”使农民受到很大的损害。一九六一年春天，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几个组进行农村调查。刘少奇同志也亲自到农村调查。调查回来，少奇同志谈到，他在湖南，农民跟他讲：你们这几年搞得实在不象样子，可是我们没有上街，没有打扁担，更没有造反，共产党大概睡觉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等你们睡醒来。现在果然等到了，你们醒来了，下来了，听我们的话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那种困难情况下说的很富有感情而又意义深刻的话，表明我们党同农民的联系是多么紧密。我们搞现代化，还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也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搞现代化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现有的劳动力要相对减少，怎么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陈云同志说，我们讲实事求是，就要考虑十亿人口中有八亿农民，这是最大的实事。我们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问题作为基本的出发点，考虑怎么使农民这个大头能够安下来。所以他提出，要下决心从国外进口一批粮食，减少从农村征购粮食的数量，使农民休养生息。少向农民征购粮食，农民自己吃饱了，就可以有积极性，有条件发展多种经营。没有这一条，我们推

行生产责任制，就要遇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困难。我们现在农村实行的这一套，是适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是适合我国经济结构的情况的。其前途正象耀邦同志讲的，方兴未艾。这套东西能够从外国模式里抄来吗？照搬这个模式那个模式，能象我们现在这样搞得好吗？

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办事，走自己的路，就涉及到中国同外国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我们党同其他兄弟党的关系问题。开幕词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话虽然很短，但确实说出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话，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心里话。耀邦同志在报告中说：“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建国三十三年来，我们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这些我们党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一贯遵循的原则，也是十二大开会以前和十二大以后我们处理各种国际关系所坚持的原则。大会报告发表以后，在国际上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对外政策部分。国际上对整个大会，特别是我们的对外政策，反应是好的，态度比较公正。

这里，我想讲讲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问题。

关于中美关系。八月十七日公布了中美联合公报。这是继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之后中美关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问题是我国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这样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公报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表述了我们的看法。共产

党人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看美国以后的行动。在同他们谈判中间，在我们领导同志同他们个别谈话中间，都一再说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问题，这是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乌云。他们表示，要力求做到不因为与台湾关系法而损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这只是口头承诺。最近，美国有些人讲，减少向台出售武器数量，要考虑到美元贬值的因素，过去一年六个亿，今后七个亿也是减少。象这样一种动向，很值得注意。昨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条消息，讲美国有一小股反华势力又活跃起来，正在盘算如何迫使美国国会做出使中美联合公报从属于《与台湾关系法》的解释，以阻挠美国政府履行中美联合公报，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人民珍视同美国人民的友谊，但是从来认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维护我国主权，都不允许别国损害我国的主权。

关于中日关系。从七月二十七日开始，我们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的问题，在报刊上公开地对他们进行批判，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交涉。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很清楚，日本确实有一小撮人在进行复活军国主义的活动，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一样，日本大资产阶级中间也确实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以为在中日关系中，中国有求于日本，不管他们怎么干，中国都会吞下损害自己国家利益的苦果。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对于他们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日本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教科书的一些执笔者是反对的，日本在野党和社会团体，以及自民党内的一部分人也是不同意或反对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而且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日本人民

首先起来反对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要求日本政府改正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我们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在日本人民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日本官方、民间都很注意十二大报告中关于中日关系的部分。很多人对报告将中日关系放在第一位很满意，认为报告批判复活军国主义，也不是指他们的人民，也不是指他们的政府，而是指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这样可以得到安慰。他们普遍注意报告中关于中日关系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即“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关于中苏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有着长期的友谊。目前中苏关系成为这个样子，责任在苏联执行了霸权主义政策。苏联现在包袱背得很大。象越南这样的国家，就是包袱。原来以为阿富汗问题能很快解决，现在看来遥遥无期。去年以来又碰到波兰问题。他们想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我们要保持严肃的、清醒的态度。考虑同苏联的关系，不能只是看到苏联在我边境陈兵百万，对我们进行武力威胁。这一点很重要，但事情不止于此。中苏关系不只是两国的双边关系，应该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苏联实行霸权主义政策的问题。他们实行霸权主义政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反对霸权主义，是我们国际战略的基石，是我们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不能后退。多年以来，我们敢于同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斗，以至大军压境、陈兵百万，我们也不害怕。我们讲过，他即使把北京、华北都占了，这也只是战争的开始，绝不是战争的结束。中国人有那么一股劲，你打来了，就一定要和你拚到底，十年不行，二十年照样干下去。阿富汗是个不大的国家，但是苏联征服不了，人民的反抗是很有力的。要征服中国，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

十二大的报告不写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再次表明了我们对苏联人民的友情。我们也不写苏联是修正主义，因为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这样的用语只适合于说明党内的倾向。一个党的路线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的一篇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阐述：“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耀邦同志在报告中也讲了我们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党与党关系应该遵守的原则。报告说：“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是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大党还是小党，历史长的党还是历史短的党，执政的党还是没有执政的党，都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我们党吃过自封的老子党企图控制我们的苦头。众所周知，我们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胜利，就是抵制了这种控制的结果。”“我们坚持各国党应当互相尊重。各国党都有长处和短处。由于处境不同，各国党对形势和任务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友好协商和互相等待来逐步解决。我们赞成各国党都从别国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学习，这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我们将始终遵奉这些原则。

总之，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确实如开幕词所说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我们在延安唱过一首歌，其中有这样的话：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实际上主要是说，在我们中国共产

党里面，集合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共产党人要干大事业，要在全世界推翻一切剥削制度，要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是无限光明、无限美好、无限幸福的社会制度。实现这个理想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坚信，这个理想终究要实现的。我们活着的共产党人，应该把全部身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这个事业，经过我们的努力一步一步使我们的国家以至于全世界越来越接近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从事这样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最高尚的人，最光荣的人。我们同外国资本家交往，同华侨及港澳同胞中的资本家交往，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后的宗旨也还是为了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可是在合作的时候，总是想到不能够丢掉共产主义的旗帜，不能辱没共产党人的身份。这几年来，因为对外开放，同资本家的交往多了，也确有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贪图小利，接受贿赂，甚至向人家敲诈勒索。得到一部电视机，得到一部录音机，得到一点洋玩意，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以至于在资本家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丧权辱国，丧失了国格，丧失了党格，同样也丧失了人格。我们在学习开幕词的时候，在学习报告的时候，有必要重温共产党员究竟是干什么的道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应该具备什么起码的道德，以便使我们今后的言行，能够无愧于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的光荣称号。

（三）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核心是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

十二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面二十年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重点，要求到本世纪末，使工农业年总产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

十二大肯定了五届四次人大批准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又根据新的经验、新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报告有个重要的提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幕词的提法，文字上有点差别，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个重要提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几个重要原则：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些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各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今后两个十年的安排，今后各五年计划的制订，都要坚持这些原则。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认识一致、行动一致。

大会期间，一位有一定影响的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文章开头就说，“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如何。不能怀疑作者的诚意，作者不是说假话的人，他很想为实现十二大的目标做些工作。可是，文章的一些主要论点却同十二大确定的方针不一致。十二大报告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说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的计划，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报告讲，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根据需要，下达一些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派购。然后讲到指导性计划，最后讲到市场调节。

报告强调要坚持指令性的计划，这是很清楚的。可是，上述文章却不适当地贬低指令性计划，强调指令性计划的缺陷。大会期间出了这样的文章，谁能够说，大会以后，在执行中间都不会犯错误，都那么准确？这实在应该使我们大家引以为戒。在组织上指出文章的问题以后，作者已经作了自我批评，态度是诚恳的。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也对他进行了批评，态度是认真的。

《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评论员文章，着重阐述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允许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存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问题，适当地批评了前述文章的错误。评论员文章没有对报告中关于建设和生活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问题展开阐述。起码还需要有文章讲讲这些原则。比如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就是很重要的问题。没有资金的集中使用，重点建设要落空，后十年的经济振兴就成为空话。方向明确了，原则同意了，落实到工作中还会有许多问题。现在就有许多问题，将来还会有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可能很多问题解决得好，有些问题解决不好，会碰钉子，会受挫折。那就要继续做工作。象这样的问题，写写文章，讲点切实的道理，很有好处。

#### （四）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

第一项，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机构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全面的改革，还需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拟定方案，逐步进行。要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又是坚持不懈地搞下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关系就要

调整得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上层建筑也要进行调整，以便于保证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所以，小平同志讲，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长期都要进行的工作。我们经济建设的前进，要伴随着机构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

今年七月，小平同志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以后，讲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很重要的意见。他说，体制改革，中心应该抓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改革得好不好，不仅看它订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文化大革命”前大、专毕业生和自学达到同样水平的知识分子五百多万，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要议出几条办法来，把真正的人才提起来。要加快这个步伐。各行各业，包括企业，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说，最难的是，没有一套办法，把这些知识分子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才能积累经验。这些时候搞名单，一说某某有点骄傲情绪，就认为不合格。他就不赞成这种不加分析的说法。没点自信的人，是很难干出什么事情来的。有些人有些毛病，掌了舵，会改的。我们的企业要想办法给“明白人”开一条路出来，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起来，不能老把这些人卡住。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

小平同志所说的“明白人”，我理解，就是符合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的人，而现在特别要使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更快地成长起来。“明白人”是通俗的用语。这样说，群众容易接受。

第二项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政治报告非常鲜明、非常突出、非常深刻地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怎样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过去我们比较多地注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些方面，而对于精神领域，不是没有提，但是没有提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大会指出，除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方面的特征外，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这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按照十二大报告的精神，进一步研究和进行发挥、论证，特别是需要在实践中间使它具体化，使它越来越完善。

十二大开会以前，在相当一个范围里头，曾经把报告稿子发给大家，请大家进行讨论，提出意见。讨论过程中间，有的同志提出，要不要对精神文明进行阶级分析。去年十一月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报告，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都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精神文明包括文化建设和社会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我们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对精神文明应该作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是不能认为，精神文明的每一项具体内容都具有阶级性。例如，文化教育，在它的指导思想、在它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上，当然是有阶级性的，可是它的许多具体内容，例如一般的文化知识，象数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象体育、卫生等等，它的具体内容就很难说有阶级性。思想建设方面也不能说统统都有阶级性。其中有一部分，包括了任何一个社会要存在、要发展，社会的公共生活要正常运转，都必须具备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举个很普通的例子：交通规则。有的国家行人靠左，有的国家行人靠右，有的国家汽车的方向盘靠左，有的靠右。还有红灯

绿灯，绿灯开了就放行，红灯开了就止步。我们“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闹了笑话，说靠右边走是右派，一定要改到靠左边走，说红灯才应该前进，绿灯应该停止吗？在讨论中间，我们有些同志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说讲礼貌也有阶级性。你替我做了一件事情，说“谢谢”；我踩了你的脚，说“对不起”，诸如此类的礼貌用语，如果硬要去分成什么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那我们的生活就没法正常进行。说你说的谢谢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我说的谢谢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谁也分不清楚这种阶级性。

小平同志四月三号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的时候，只讲了三句话：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后来他让我们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很多同志建议加上有文化。理由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文化不行。小平同志同意加上这句话。所以在交七中全会讨论的稿子里面，已经说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有些同志还坚持他们的意见，理由是：强调了文化，就会使共产主义的核心作用、指导作用不鲜明，不突出。这样一种意见，就把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同有文化对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革命的理想、道德、纪律，没有一项不是同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联系的。列宁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们的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现在的解放军，一向有个传统，文盲一到军队，就要让他们识字、学文化，成为能够读书看报的战士。部队还设有专职的文化教员。毛泽东同志还讲，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你字都不识，句子都念不通，勉强念通了以后，

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怎么领会理论的精神实质？我们党重视文化的作用，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革命的力量。现在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应该重视这一点。

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上，十二大开会前夕，《解放军报》发表了赵易亚同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解放军报》已经准备公开发表文章对赵文的观点进行批评，并作自我批评。

报告对于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阐述：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能够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这几年来，我们着重解决国民经济内部各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问题，在调整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十二大报告把教育、科学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过去我们的计划只是经济计划，偶尔提一句两句教育、科学、文化，但是不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从“六五”计划起，计划的名称改了，叫作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等，将作为整个计划里不可缺少的重要的部分。这是我们工作的一大进步。这些年来，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和科学的部分，也确实增加得不少。但是，从认识上、工作上来说，我们一直还没有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同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问题提上日程。我们过去注意了经济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也注意了教育、科学、文化方面财政支出的增加。但是没有象调整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那样，调整经济发展与教育、科学发展的比例，没有看到除经济内部比例关系不协调、需要调整外，还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科学

的发展很不协调。这个不协调确实很严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很重要，可是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设施，也很难搞。一个好的发明创造成功了，要推广、加以应用，在更大范围里发挥作用，一篇好文章、好小说要给人们以启示、以激励，首先离不开出版、印刷、发行，离不开纸张、仓库、交通等等。上演剧本、拍摄电影，都要物质设施。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只是脑子里想，嘴巴里说。要在广大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就离不开必要的物质设施。举一个例子，李燕杰同志在青年里头做思想工作，灌输了进步思想，有助于解决相当一部分青年的思想问题。他现在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请他报告的单位很多，天天有人去访问他，来往信件堆积如山，结果把身体搞垮了。好在他把自己的讲演编成了一本小册子。这就需要出版社来接收，需要印刷，需要经过新华书店发行，需要装卸、运输，送到读者手里。你能够说，只要李燕杰讲一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推广了？现在出了书，好多了。如果能够把他的各次讲演分门别类，对青年学生讲的，对青年工人讲的，对机关干部讲的，都有针对性，不同对象有不同内容，不同问题有不同回答，分类之后，录音录像，通过电视、广播或其他方式和广大青年见面，效果不是比出书大得多吗？这就需要录像机、录音机、播送台等等。在座的都是负责干部，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呼吁一下，大家都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就要想点办法使必要的物质设施不断得到增加、得到改善，要在这方面花点钱。国家有困难，可是如果从别的方面省一点钱出来，减少一点浪费，是可以比现在搞得好的多的。不客气地讲，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中间，由于自己文化不高，因此不太懂得、也不太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希望同志们在党校学习，提高文化以后，在工作中切实地重视和支

持精神文明建设，来个转变吧。

再拿出版事业来讲，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所谓“书荒”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出书难，出版周期越来越长，人民出版社一部稿子发到印刷厂要一年以后才能够出书。这还算快的。有的同志讲，国民党的时候，教科书不发生开学以前到不了学生手里的问题，那个时候只发生一个问题，穷人家孩子交不起学费，买不起课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三年了，上学的孩子多了，能交得起学费、买得起课本了，这是我们的成绩。可是，这些年来经常出现开学以后教科书没有到手的现象。为什么呢？印不出来，送不到手。我们很骄傲，因为历史上造纸、印刷术是我们的祖先首先发明的。可是看看现实，我们能够不惭愧吗？一个造纸，一个印刷，我们在世界上如果不是最落后的，也落后得相当可观了。

还可以讲讲其他方面。广播，我们的土地复盖面只有百分之十七，还有百分之八十三的地方到不了。城市里除了机关团体的礼堂，原有的电影院解放后到现在，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这么一个中国，只有近两千个图书馆，四百多个博物馆。本来文盲接近扫除了，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果又增加了。

同志们，不要以为搞精神文明建设只是花钱的事情。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不仅成为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一种标志，而且将大大地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新技术的普遍采用所创造的财富，决不是数字可以计算的。黑龙江在11,000亩土地上种大豆，采取了一点新办法，增产20%，每亩增加纯收入21元。有些地方种棉花、花生、水稻，使用地膜复盖，仅此一项，就增产30%到40%，一亩地多产30—40斤皮棉、100—200斤花生、150—200斤水稻。出版要花点钱，但是出版系统每年还给国家创造几个亿的利

润。全国仅电影一项，每年收入十几个亿。出版印刷的发展可以刺激机械工业的发展。电视机多了，国家出售电视机可以增加收入，并且有助于电视工业本身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我们要看到它同整个国家各项事业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非常重要，但是需要我们做切实的工作，需要我们具体进行物质方面的基本建设。还有很多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够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停止在手工业的水平，而应该发展到现代化的水平，这才能同整个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第三项，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

今年四月十日在讨论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文件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行不过一年两年的时间，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国家在经济上受的损失也不小。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煞住这股风，有的干部、有的党组织，一定会发生三五年变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至少要伴随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要有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这件事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实现四个现代化，包括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保证。

报告除了讲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以外，还提出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也存在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大家已经知道西安的劫机事件。也有极个别与敌台、敌特挂勾

的事件。由于对外开放，淫秽反动的录音录像、图片、书刊涌进来，腐蚀了相当一批人。这类在解放初期已经被禁绝了的活动，现在又死灰复燃。严重刑事案件也时有发生。所以，报告说，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向我国人民进攻，这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这个提法包含一个意思，我们不是把一般犯罪活动统统看成阶级斗争，而是看作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这种一般的犯罪活动，不能等同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阶级斗争，更不能够说成是敌我斗争。

有的同志问，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这个某种条件指的是什么？就目前阶段的情况来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是条件之一。小平同志七月四日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了两句话：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会发生问题。据我的理解，这里说的，就是阶级斗争可能激化的条件问题。

有的同志对于中央提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一场腐蚀反腐蚀的斗争，有一点埋怨情绪。他们说，你看，没有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不是这些事情都没有吗？因此，对于这样的政策是不是要继续，是不是要坚持，发生了怀疑。耀邦同志曾经要我们回顾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一九三七年，我们同国民党重建统一战线以后，蒋介石妄图在抗日战争中间削弱中国共产党五分之二的力量，后来，又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并且把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改变成为“溶共”政策。这对于我们党内不坚定分子确实发生了作用。先有王明的新投降主义，接着又有张国焘的叛逃出走，后来也有一些部队被国民党吃掉，有些没有出息的共产党员，同国民党官员接触，人家在肩膀上拍一拍，就

以为身价倍增。我们有些同志，看到国民党军官戴个军衔牌牌，也有点羡慕。我们的党中央，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不是因为党内、军内出现了这些被腐蚀的现象，就说不要搞统一战线了呢？毛泽东同志英明地、及时地提出了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号召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提出反对阶级对阶级、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后来，又总结两次革命时期的经验，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教导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不管实行什么样的社会政策，都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纯洁性，不能够允许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斗争的结果怎么样呢？是国民党把共产党“溶化”了，还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败了？这不是大家清清楚楚看到的事实吗？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当然大不相同，可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历史经验，不是可以给我们很好的教益和启示吗？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执行过程中也确有缺点错误，正如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中所说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必要的管理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对已经发现的某些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没有及时给予有力的打击；也还由于有些同志对政策的理解不正确，执行中间出了毛病；也还由于种种原因，正确的政策被有些人歪曲了。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陈云同志讲的，要总结经验。我们吃了一点亏，可以而且应该学得更聪明一些。我们完全有信心使我们的现行政策更加正确，更加完善，完全有信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更大的发展。

第四项保证，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好的党章。这是党内

党外一致公认的。十二大决定用三年时间，按照党章的规定，进行全国范围的整党，这也反映了党内党外共同的愿望。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党的决心，看出中央对我党的组织、党员成分的情况有清醒的估计。大会提出实现三个根本好转，主要是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这三条都是很得人心的。党内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同志，从中得到很大的鼓舞和鞭策。有了这几条，每个党员就有了衡量自己的标准，有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大家可以根据党章，根据十二大的精神，衡量一下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哪些合格，哪些不合格，不合格的地方，也知道该怎么努力改正。党内还有些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就是为了谋取私利。对于这样一些原来入党的目的就不正确，入党以后干了一些损害党、损害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以后也不想改正的人，公布了党章，决定了要整党，又下决心要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他们就被置于非法的地位。人民群众和党内的同志也可以根据十二大精神对这些人进行监督。

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同时也证明，如果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某些单位领导软弱涣散，也不能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党风不正，你这个党组织里三个不纯很严重，党员、领导干部很不象样子，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公社主任言行同党章相违背，你能够实行党的领导吗？你说话人家相信吗？群众不相信，不买账。所以，党的状况如何，是各项任务能否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实现的最关键的问题。小平同志也讲，四项基本原则，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要我们按照十二大精神、按照新党章把党整顿好了，我们就完全有把握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地到达目的地。而要把党整顿好，首先又要求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模范地遵守党章。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决不要有一种思想，以为党章条文我都知道嘛，我几十年都是这样做的嘛，因此，新党章只是对新党员、普通党员适用，需要照办的只是他们，自己呢，照样我行我素。如果有这样的思想，那就糟了。报告和党章的规定，对党的各级干部，提出了比一般党员更严格的、更高的要求。这不能成为一纸空文。整党整得好不好，党风的根本转变能不能够实现，决定于各级领导干部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执行党章的各项规定，带头改正不符合党章规定的各种弊病，带头把自己整顿好，把自己所在的单位整顿好，这样，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整下去，那就会使全党满意，使全国人民满意。不这样做，只是对下不对上，对别人不对自己，那是不行的。邓颖超同志在七中全会讲，党章很好，现在的问题就是看能够不能够实现，而要实现，首先要从干部开始，从领导干部开始。我完全同意邓大姐这个看法。

我主要讲这么四个问题。

中央批准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的安排时指出，各级党委要以开幕词作为总的指导思想，把十二大文件的学习、宣传切实抓好，认真组织贯彻执行。今年八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提出要以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精神，来领会、学习、贯彻执行十二大的全部文件和全部决议。有同志问，应该怎样理解这两个提法。我们认为，两个提法精神上是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各有侧重。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

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这段话的精神，来理解上面两个提法。

我在开头引用了小平同志看望金日成同志时候说的话，就是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七大所规定的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十二大根据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两次大会，规定了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目的都是一步一步地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提出，运动的发展，都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都要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同时，又要把握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同将来实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区别出来。以开幕词作为总的指导思想，首先要学好开幕词，以便提纲挈领，抓住要点，更好地学会和把握大会文件和各项决定的基本精神。这样，就能高瞻远瞩地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提出的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学好开幕词，再学其他文件，比较容易学懂，然后再回头来学开幕词，理解就会更深一步了。

关于十二大的文件和精神，还有乔木同志总的传达。我就开幕词讲的这些意见，只供同志们参考。有缺点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出。谢谢大家。